

经济全球化与劳工反建制主义的兴起

——对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比较研究

田 野 云谱萱

内容提要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贸易的扩张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价格的均等化,从而对劳工、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和财富带来不同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资本要素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稀缺状态。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三国的地主和资本家通过对政权的把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经济实力和规模因世界贸易扩张而受损的趋向。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这三国劳工的经济实力和规模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日益壮大,从而为其集体行动积聚起更广泛的政治资源。随着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三国劳工针对土地和资本要素所有者在抗争政治和常规政治层面都展开了政治动员,劳工的反建制主义由此兴起。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 反建制主义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国际贸易 要素禀赋 劳工

*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 100872);云谱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6 级硕士生。(邮编:100872)

** 本文为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反建制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新挑战”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章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作为整个世界逐步在经济上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至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日就已经开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会使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而且会使各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②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劳工运动在欧洲各国的同步扩散就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断。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萌芽状态快速生发,启动了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则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激荡的时期正是欧洲各国走向民主政体的重要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在这一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中叶出现,并成为19世纪后半期推进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进程中,工人阶级实现政治觉醒,进而通过多种动员方式来维护经济利益和争取政治权利,其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

有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工人运动大多在经济复苏或国际贸易的高潮年份成串发生。^③在1840—1914年间,全球经济的衰退发生在1840—1842,1848,1853—1854,1857—1859,1867—1868,1873—1874,1875—1876,1878—1879,1882—1884,1901—1902,1903—1904,1909年,^④也就是说,其余年份全球经济都呈现出上升态势。如果用公开抗争的频率与协调性来测量,19世纪40年代以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政体的危机集中表现为1849—1851年间连续发生的革命和政变、普法战争时期的巴黎公社和20世纪初期全面的罢工运动。^⑤这些社会抗争都是发生在经济复苏或国际贸易的高潮年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② 同上书,第306页。

③ [德]J.李:《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载彼得·马赛厄斯、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册,徐强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3页。

④ Lee A. Craig and Douglas Fisher, *The European Macroeconomy. Growth, Integration and Cycles 1500—1913*,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0. p. 332.

⑤ [美]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13页。

德国工人同样巧合地利用了诸如 1872 年、1889 年和 1905 年等年份的经济景气,进行大规模罢工,比如 1872 年德国几大城市相继发生了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斗争,1889—1890 年间近 40 万德国工人对建制派的统治表示抗议。尽管其他时期法国、德国也爆发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但这些危机都没能制造出上述系列公共动员那样的幅度和影响,从中不难看出工人运动与全球经济扩张的正相关性。

因此,工人罢工的动机不仅仅源于直觉的抗议表达,更可能是一种对国际贸易扩张这一变动带来的机会进行的有效利用,以谋取更多的利益和权力。那么,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欧洲大陆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与全球化掀起的贸易扩张有何相关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论证 19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运动的合理性及社会变革的必然性。^① 英国学者韦伯夫妇提出劳工运动既要有政治方向,又要有经济方向,提出著名的产业民主理论。^② 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诸多学者分析了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冲突和工人运动。基于这些文献,美国政治学家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将工人阶级形成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经济为中心,着眼于资本主义和阶级发展的内部分析,包括经济变化的基本动态、工作和劳动力市场模式的变化等;第二类以社会为中心,寻找影响工人阶级形成的宗教因素、人口数量和结构因素;第三类以国家为中心,聚焦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政权的强弱、政治参与的程度、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等。^③ 从总体上看,既有的主流解释模式没有充分关注到国际贸易对劳资冲突和工人运动的影响。

当然,也有少数文献关注到两者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学者发现,19 世纪国际贸易的扩张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推动阶级结构的演变:工人和中产阶级队伍扩大的同时积聚起自我结社的能力,精英更难将工人和中产阶级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土地贵族这一持续反对民主化的力量被削弱了。^④ 不过,他们仍缺少完整的逻辑链条

①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Sidney Webb, Beatrice Potter Webb, *Industrial Democracy*, London: Longman, 1920.

③ Ira Katznelson, Aristide R. Zolberg,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 Evelyn Huber,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John D. Stephen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7, No.3, 1993, pp. 71-86.

能具有说服力地解释国际贸易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国际贸易究竟如何传导到国内政治领域从而导致工人阶级与建制派的斗争,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文将从参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入手,分析全球化导致的贸易扩张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洲大陆国家劳工反建制主义运动的因果关系。19世纪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不过,地域辽阔的俄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上相当不同于其他主要欧洲大陆国家,而奥匈帝国由于后来的解体等因素其历史资料缺乏系统性。鉴于法、德、意三国在要素禀赋上的相似性和历史资料的相对系统性,本文主要依据经济史和政治史资料,探讨作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法、德、意三国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和三国劳工反建制主义之间的关联。

一、国际贸易、要素禀赋和反建制主义的兴起:一个分析框架

在国际经济学中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罗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说明国际贸易的变化对国内利益分配进而对政治分化产生的影响。^①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国际贸易的扩张使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损;而国际贸易的收缩使一个国家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使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损。那么,国际贸易变化引发的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财富分配差异会带来怎样的政治联盟的分化呢?罗戈夫斯基由此将一个经济问题转换为一个政治问题。

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是指一个国家拥有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一个国家供给相对多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充裕要素,供给相对少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稀缺要素。罗戈夫斯基采用传统的三要素模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他首先以土地-劳动力比来衡量一国在土地、劳动力这两个要素方面的禀赋程度(即假设没有一个国家在土地和劳动力上都是充裕的或都是稀缺的)。土地-劳动力的较高比表明该国土地充裕而劳动力稀缺,土地-劳动力的较低比则表明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充裕。至于资本要素的衡量,罗戈夫斯基按照资本要素禀赋状况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充裕的发达经济体,一类是

^①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资本稀缺的落后经济体。由此,贸易扩张会导致以下四种政治分化:(1)土地充裕、劳动力稀缺的发达经济体中,贸易扩张壮大了资本家和农业集团,限制了劳工和劳动力密集行业的权力和发展;(2)土地稀缺、劳动力充裕的发达经济体中,劳工和资本家从贸易扩张中受益,彼此联合向大地主和贵族精英发起挑战寻求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3)土地充裕、劳动力稀缺的落后经济体中,仅有农业集团支持贸易自由,城乡分化加剧;(4)土地稀缺、劳动力充裕的落后经济体,劳工追求自由贸易并试图提升政治经济地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时可能会发动工人运动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①

罗戈夫斯基随后又放宽土地劳动比的假设,承认两者都充裕或都稀缺。由于土地、劳动、资本三种要素不可能都充裕或者都稀缺,放宽土地劳动比的假设后只有两种可能性:(1)发达经济体土地和劳动都稀缺。贸易扩张只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受损的农民和劳工将联合起来形成红绿联盟来支持保护主义,而受益的资本家则可能建立专制政权来追求自由贸易;(2)落后经济体劳动和土地都充裕。贸易扩张动员了红绿联盟,农民和工人将会从自由贸易中受益,他们会联合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并限制资本家的权力。^②

通过上述分类,罗戈夫斯基建立起基于要素禀赋的政治分化模型,但他的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围绕贸易政策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分化,即哪些阶级支持自由贸易哪些阶级反对自由贸易。尽管罗戈夫斯基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有所提及,但尚未在逻辑上向更深处拓展并系统说明这种扩展的依据。鉴于此,本文参考罗戈夫斯基的理论,在其基础上具体阐明一定前提条件下国际贸易与劳工反建制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因果机制。

对反建制主义的考察首先需要对建制派(establishment)与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加以区分。由于使用“建制派”一词的既有研究通常都默认其内涵已反映在文本中对应的群体上,“建制派”缺少规范的定义。在为数甚少的规范性定义中,英国历史学家费格斯·坎贝尔(Fergus Campbell)根据个体在政治、经济、宗教和行政的正式地位是否能在当下时期对所处社会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来定义建制派。通过研究从187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爱尔兰的建制主义是如何演变的,他得出结论:尽管从中观层面上看,爱尔兰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都经历了重大变化,但建制派的构成依旧是稳固的。地主

^①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p. 7-8.

^② *Ibid.*, pp. 13-15.

阶级和新教中产阶级(尤其是商人和专业人士)把持着关键权力,天主教中产阶级几乎被排除在建制派精英之外。^①美国政治学家阿米尔·阿比迪(Amir Abedi)给出建制派政党的定义,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建制派政党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素:第一,可以直接参政或被执政党看作组建政府的好伙伴;第二,愿意通过和主要的执政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②另一类文献重点关注反建制派,从反建制派的内涵出发反向定义建制派。有部分学者用“民粹主义”来反映反建制主义现象。^③英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强调民粹主义可被看作是反对现有权力和主导价值形态的人民的呼吁,这里的人民不包括腐朽的政治家和毫无代表性的精英阶层,这些人与人民之间存在深刻的裂痕。^④政治学家安德烈亚斯·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引入了“反政治建制派”(anti-political establishment party)概念,强调人民与政治建制派的根本分歧,那些试图宣扬建制派的外部性并同时宣称自己与建制派有很大的区别的群体被称为反政治建制派。^⑤在强调反建制派的概念界定时,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提出细分反建制派的标准来精确反建制派的内涵,德国学者奥托·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特别强调其中有的派别忠于现行的政治体制而有的对游戏规则无法认同。^⑥

众多观点表明,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定义很难基于特定的人群构成来定义,其内涵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变换有所不同。如“建制派”在英国一般被用来指代政治、地主、企业主、宗教和行政等精英团体的集合,他们组成拥有信仰和价值观并愿意治理国家的统治阶级。^⑦在19世纪末的爱尔兰则烙上鲜明的宗教色彩,同样职位上的个体,新教教徒而非天主教教徒组成建制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找出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主要特征,建制派总能在现行体制

① Campbell Fergus, *The Irish Establishment 1879—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8.

② Amir Abedi, *Anti-political Establishment Par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0-12.

③ Peter Worsley,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in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p. 242-247.

④ Margaret Canovan, *Popu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1; Margaret Canovan, "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30, No.4, 1982, pp. 544-552.

⑤ Andreas Schedler, "Anti-Political-Establishment Parties," *Party Politics*, Vol.2, No.3, 1996, pp. 293-304.

⑥ Otto Kirchheimer, "Germany: The Vanishing Opposition," in Robert A.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37-259.

⑦ W. Hutton, "The Power 300," *Observer*, Supplement 1, November, 1998.

下有充足的途径持续地参政并有充分权力来塑造政治社会：掌握政党系统，决定选举章程，控制资金分配，决定社会重大决策。这无关于他们是否一定能成为政府官员和议员，或者某利益集团的领导，能否是拥有超群才能和完美品格的精英，尽管现实中建制派常与以上人群挂钩。反建制派则将自己看作是建制派的挑战者，试图在某些主要的政策议题和政体议题上向建制派发起挑战，但因缺乏充足的参政渠道无法获取重要权力，他们宣称建制派与人民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分歧而自己是普通民众利益的捍卫者。据此，在19世纪4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建制派虽在不同年代的法、德、意三国指代不完全相同的具体群体，但主要指代掌握政策制定权的大资产阶级、地主和封建贵族；相应地，反建制派主要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工构成。

反建制主义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思潮也可以是一种政治行为。本文将在后者的意义上来讨论反建制主义，即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是反建制派针对建制派而展开的政治动员。所谓“动员”，通常指一个集团从消极的个体集合转变为公共事务积极参与者的过程。^①通过政治动员，反建制派可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动员指的是获取对资源的集体控制，而非资源的累积。一个集团规模的增加可以拥有更多的人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致力于集体目标的人力也绝对增加或者成比例地增加……集体控制的增加才能构成动员。没有一定程度的动员，一个集团可以繁荣，但不能争取权力。”^②根据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可以将反建制派的政治动员大致分为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下的动员和常规政治(routine politics)下的动员。^③

反建制派往往首先通过抗争政治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作为制度外的政治行为，抗争政治是行为体以集体行动方式提出社会变革的要求并因此和政府发生互动。从定义上看，抗争政治属于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包括社会运动、革命和反叛等。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渠道，反建制派为向建制派争取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抗争政治方式。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洲大陆国家工人阶级发动的罢工和武装起义可被看作反

①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p. 69.

② Ibid., p. 78.

③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 5; Javier Auyero, *Routine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Argentina: The Gray Zone of State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建制主义的主要表现。

当然,反建制派也会采用常规政治的方式来争取政治权力。简单地说,常规政治是高度制度化的政治行为,比如选举、游说、立法投票、司法判决、行政协调等。一般而言,常规政治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发生的政治行为,其核心目标在于影响政策的制定而非制度的变革。尽管既有的制度框架在总体上不利于反建制派,但有些规则如果为反建制派所充分利用也可以增强反建制派的政治资源,反建制派可以在此基础上推动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反建制派就利用选举制度改革的契机来壮大政党组织和争取议会席位,从而在议会等政治舞台上维护自己的利益。

无论抗争政治还是常规政治,反建制派都需要尽可能多地增加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在各类资源中,以收入和财富为主要指标的经济资源对增强反建制派的集体行动能力至关重要。依据罗戈夫斯基的理论,国际贸易的扩张影响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进而改变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扩张就促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价格的均等化,从而对劳工、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和财富带来不同影响,进而使劳工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就参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而言,法、德、意三国劳动力相对充裕,土地和资本相对稀缺。在这三个国家,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的贵族、地主和大资本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国际贸易扩张中受损,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的劳工则从中受益。随着收入减少和规模缩小,贵族、地主和大资本家的经济实力走向衰退,对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下降。随着收入增加和规模扩大,三国的劳工开始公开或非公开地建立和参与工人俱乐部、协会、工会等新的政治团体以求影响建制派的决策。随着这些团体的发展,工人们也开始跳出诸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狭小的经济领域,增加对公共问题和自身政治权利的关注,反建制主义愈发明显。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劳工开始广泛地运用起手中的资源进行常规和非常规的政治动员。首先,劳工发起的社会运动具有明显的斗争色彩。在工业化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社会中,工人的力量如果得到增强,他们就更有能力采取社会抗争。这一时期欧洲反建制派通过罢工、抗议游行和起义暴动等各种抗争形式对建制派发起挑战,试图以非常规的政治手段来打破建制派对政治生活的主宰;其次,随着欧洲各国选举制度的改革,反建制派劳工参与选举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与此同时,随着反建制派劳工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党派得以创建。这样,劳工可通过常规政治手段

例如选举、立法投票等表明政治立场,并进入立法机关发挥影响力。法、德、意三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及其政治影响力的增加就是这一时期反建制主义的最重大成就。

简言之,19世纪欧洲的“百年和平”下隐藏的是各国以贵族、地主、资本家为代表的传统建制派与逐渐崛起的中下层劳工为代表的反建制派这两股政治力量的斗争。随着1840年—1914年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贸易迅猛和广泛的扩张,劳工力量在欧洲大陆国家迅速崛起,反建制派对建制派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通过社会运动和政党选举等形式,劳工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反建制主义运动由此兴起。

二、法、德、意的要素禀赋与要素所有者的政治分野

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相对于英国,法国在经济上全面落后,在运输、技术、金属制造及工业动力来源上都落在英国后面。^①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还处于分裂的状态,它们在经济水平上更远远落后于英国。即使三国的经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加速发展后,在19世纪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内其发展水平与英国相比仍属于落后状态。那么,作为相对落后的国家,法、德、意三国具有何种要素禀赋呢?

首先,可以借鉴罗戈夫斯基用人口密度辅之以每平方公里生产用地上的数量两个指标,对法、德、意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禀赋状况进行分析。19世纪欧洲的人口密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亚洲国家高,与美国相比更是数十倍有余。每平方公里生产用地的数据同样检验出,法、德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结构为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充裕。^②

通过对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的分析可进一步检验三国的土地-劳动力要素情况。关于法国的人口统计,有一个显然的基本事实:18世纪末,法国是欧洲的人口大国,此后法国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但法国劳动力充裕的态势在整个19世纪并没有因人口数量增速的放缓而变得匮乏,总人口

① [美]赫尔曼·施瓦茨:《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徐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②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7.

依旧维持在了 3000 万以上。1851 年和 1911 年,潜在适宜工作人口分别增长至 2384.5 万人和 2717.6 万人,尽管总人口数量增长仅有 40.2%,但 1776—1911 年间潜在适宜工作人口增长足足有 64.7%。^①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国外国移民的增加,1851—1911 年间,在法外国人数量翻了三倍且以年轻人为主,缓和了法国自身人口可能带来的劳工短缺问题。德国的人口在 19 世纪呈现稳定增长的势头,人口结构本就相对稳定,1850 年为 3500 万人,1914 年达到 6700 万人。^② 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1852 年与 1911 年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德国 14—64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63% 以上。^③ 意大利统一较晚数据难以精确,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多山脉多山丘的地貌特征导致耕地占国土面积比重仅有 20%。^④ 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口增长迅速,在 1850 年意大利人口为 2430 万,1880 为 2820 万,1900 年为 3240 万人,^⑤ 从而导致原本有限的临海可耕种土地不得不被人工开垦以作他用,可见,意大利也属于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因此,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属于土地要素稀缺、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

其次,进一步对三国的资本要素状况展开分析。由于缺乏人均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分析,将法、德、意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最发达的英、美两国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欧洲大陆三国处于劣势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与英、美的差距逐步缩小。^⑥ 因此,法、德、意三国资本要素处于快速增长状态,法国的部分大都市率先迈入资本充裕行列,德国在 1890 年后成长为资本充裕国,意大利统一较晚,资本要素仍处于上升积聚状态。辅之以人均工业化指数指标,可以发现,法、德、意工业化进程比英国起步晚,发展速度虽不及美国也已领先于欧亚大部分国家,快速的工业发展带来资本的快速积聚。因此,法、德、意在本文探讨的这段时期尽管处于从落后经济体逐渐变为资本充裕的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但与更先进的

① [法]伊夫·勒坎:《大革命以来法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状况》,载彼得·马赛厄斯、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册,徐强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1 页。

② John E. Knodel,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Germany, 1871—193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2.

③ [德]J. J. 李:《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载彼得·马赛厄斯、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册,徐强等译,第 551 页。此处 1852 年的数据仅指普鲁士。

④ Vera Zamagn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taly 1860—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8.

⑤ <http://www.tacitus.nu/historical-atlas/population/italy.htm>, 2017-04-04.

⑥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9 页。

英美相比,仍处于资本稀缺的状态。(参见表1)

表1 拜罗克人均工业化指数

国家、年份	1860 ^a	1913 ^a
英国	64	115
美国	21	126
法国	20	59
德国	15	85
意大利		26
俄国	20	20
日本	20	20

a 100=英国1900年时的水平

资料来源:Paul Bairoch,“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11, 1982, pp. 281, 333。

综上,19世纪4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德、意三国就要素禀赋而言都是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的国家,资本要素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稀缺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德先后迈入资本充裕要素国行列,意大利特别是其北部地区也开始相当程度的工业化。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把持着欧洲大陆国家核心政治权力的是稀缺的土地要素所有者和从稀缺变充裕的资本要素所有者,这些欧洲大陆国家传统的政治精英主要是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和地主。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产阶级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在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成为新贵族。“新贵族和旧贵族同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只是一个利润在上层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如果他们的矛盾被下层所利用则可能导致双方都失去所有的一切。”^①有学者注意到,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涌现出大批资本家与地主合作结盟的现象。^②因此,在总体上将这些大地主、大资本家、封建贵族看作是这一时期法、德、意三国的建制派力量。当然,具体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建制派的内涵有不同体现。

“七月革命”后,法国建立的新王朝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据对1840年议会代表的数据统计,行政官吏约占40%,土地所有者占30%,其余30%为从事

① 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

② Flemming Mikkelse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Europe and Forms of Integr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Labor History*, Vol.46, No.3, 2005, pp. 280-306.

工商业、金融业的资产者和自由职业者，^①整个国家在这些贵族、官吏、地主的掌握之中，他们共同构成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建制派的主要力量。1830—1848 年间，法国的主政集团主要包括达官显宦和金融工商界巨富这样的富裕群体，统称为“奥尔良派”。^②他们通常是旧时代的贵族后代，垄断并行使着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希望先利用手中的国家权力保住自己的财产，同时从事与银行和贸易相关的资本运作。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有产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加速，工业资产阶级的羽翼渐丰，中产阶级兴起。金融资产阶级的资本运作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效应被工业资产阶级重视起来，这一新崛起的社会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伴随着 1848 年法国大革命，原来的大资本家和金融贵族逐渐被更有能力的工业资产阶级所取代，建制派的内涵进一步更新。

与法国不同的是，整个 19 世纪德国的主政集团都离不开容克地主这个核心群体。容克地主曾经统治着普鲁士，随着普鲁士主导下的统一又统治着统一后的德国，他们在至关重要的官僚机构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并垄断了军队里的关键职位。因此，德国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制度被容克地主的价值观主导，出身普通的士官或政府人员若想得到提拔，必须被这种主流观念同化。久而久之，国家机构和核心政策制定权被保守的容克地主牢牢掌握着。1871 年，帝国宪法正式确定了普选权，但普鲁士议会的选举根据财产组织成立了三个选举团，对工人阶级、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削弱不言而喻。^③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变换，工业资产阶级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他们为换取关税保护而与容克地主和解。^④此外，随着德国容克地主越来越多地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作为地主的角色在退化，作为资本家的色彩愈发浓烈。^⑤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Aleksander Gerschenkron) 曾将 19 世纪德国社会分类为容克地主或贵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农业集团、重工业和出口部门制造商组成的工业资本集团、劳工集团和其他集团混合体。^⑥按照这样的分类，德国建

① 许平：《19 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 年第 2 期，第 56 页。

② 刘立文：《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3 页。

③ [美]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袁明旭、朱天飏译，吉林出版集团 2009 年版，第 100 页。

④ 同上书，第 102 页。

⑤ Terence J. Byres, “The Landlord Class,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England, France and Prussia compared,”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36, No.1, 2009, p. 51.

⑥ Aleksander Gerschenkron,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制派经历了从较为单一的农业集团到吸纳部分希冀利益交换而和容克贵族展开利益合作的工业资本集团,以及其他集团中的社会精英这一变化过程。

意大利统一时间较晚,19世纪上半叶还未如西欧其他国家那样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极大不平衡、缺乏互补性。1861年,只有不到1/5的意大利人居住在米兰、都灵这样的城市中,^①绝大部分还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和地主。富裕的北方地区金融贵族和南方地区土地贵族在其势力范围内主导着政治决策的运作,构成了统一初期意大利的建制派力量:富裕阶层和金融家、实业家聚集于北方的少数几个著名的老城,他们是君主制的拥簇者,与各级官僚行政人员合作以便利用金融工具操纵国家资本;南方土地贵族阶层拥有大部分的资金,他们依靠现存势力优势操纵选民。随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形成,19世纪末期相当数量的人口被工业吸纳,大地主贵族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权被削弱,利古里亚大区和托斯卡纳大区的古老金钱贵族也逐步退出舞台,为大工厂主、大信托银行和商界新资产阶级靠近政府人士、军事官僚和内政外交创造了条件。^②20世纪初,意大利的建制派主要指这些大工厂主、商业巨头和银行家们与统治官僚,他们控制着国家的核心决策权。

在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国家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劳动者,除制造业工人外,还有技术熟练的手工业者、独立工匠、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工人,以及从事农业劳动的农奴和农民。比如工匠就是19世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靠传统的技艺谋生,包括裁缝、印刷工、屠夫、铁匠、木匠、石匠、瓦匠、画师等。^③随着19世纪下半期工业革命的推进,这些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由于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发展迅猛,工人之外的其他劳动者在整个劳动力中的比例显著下降。比如,在德国,从事制鞋的工匠人数在1890—1910年间只是稍有减少,但这一时期皮革的消耗却倍增,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而非来自不雇用工人或者雇用十个以下工人的小手工作坊。^④在工业化的经济中,工人人数以可观的速度

① [意]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沈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190页。

③ [美]查尔斯·布鲁尼格、马修·莱温格:《现代欧洲史》第四卷,王皓、冯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99页。

④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衡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39—140页。

逐渐增加,日益成为中下层民众的主要成分。不过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和先前的各色劳动者一样都属于弱势群体。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和大卫·克莱·拉奇(David Clay Large)指出的:“在先前的几个世纪里,一些社会群体——家仆、农奴、半自由的农民、工匠、手艺人,曾是社会最贫弱的阶级,但到了19世纪末,代表无产阶级的工人们却是最下等、处境最危险的一群人。”^①作为被建制派排斥的对象,工人缺乏充足的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随着阶级意识的觉醒和自身力量的壮大,法、德、意三国的工人阶级逐渐成为反建制派的中流砥柱。表2概括说明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法德意三国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构成及其与要素禀赋的对应性。

表2 法德意三国的建制派与反建制派

	构成	占有的生产要素	要素禀赋
建制派	地主、贵族、大资本家	土地、资本	稀缺
反建制派	制造业工人、独立工匠、手工业者等	劳动	充裕

三、国际贸易扩张对法、德、意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影响

自18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地开始,实质意义上的第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在考察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在1800—1840年40年间增长了135%到150%,而在1840—1870年这30年间增长了三倍多,从1870年到19世纪末,又增长了一倍多,从1901年到1913年则又增长了约50%。^②从全世界来看,1870—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都快于它们的收入增长。^③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有了空前飞跃性的发展,环绕世界的铁路网和海洋航线及纵横交错的海底电缆,把各个国家的国内市场真正汇合成为世界市场。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1860年,英法两国签订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实现了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在经济霸权国英国的有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

① [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大卫·克莱·拉奇:《现代欧洲史》第六卷,夏宗凤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7页。

②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21.

③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自由贸易政策。随着技术和政策的变革,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欧洲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世纪40年代平均15%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35%的水平。^①

从贸易类型上看,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英国主要通过出口工业制成品和服务来换取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而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国家虽然在进行工业化,但从净额上看仍是出口基础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②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容易接触到欧洲资本并且自然资源充裕,随着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欧洲大陆国家在基础产品上又面临着来自这些“新世界”国家的激烈竞争。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国际贸易扩张的结果将促进世界范围内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就要素禀赋而言,法、德、意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是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的国家,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这些国家的低工资将提高到与“新世界”一样的高工资水平,而其高昂的土地价格也将下降到“新世界”土地价格的水平。^③此外,这些欧洲大陆国家资本要素与英、美等国相比仍相对稀缺,国际贸易也会使其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下降。由于要素价格在国家间的绝对价格趋向于一致,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或增加或减少。作为稀缺要素的所有者,法、德、意三国的地主、贵族及大资本家从贸易扩张中受损,而作为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三国的劳工从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受益。这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扩张对三国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力量对比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一) 国际贸易对建制派的影响

作为建制派力量,法、德、意三国的地主、贵族及大资本家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减缓国际贸易扩张对自身利益的伤害。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农业生产者、资本化工业和脆弱产业趋向于贸易保护。1881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第一个全面的关税法案来保护工业,随即在1884年—1887年又先后通过相关法案来保护农业产品如糖类、谷物、肉类,1892年的《梅利纳关税条例》对农业

^① [英]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凯文·H.奥罗克编:《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700—1870》,何富彩、钟红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英]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凯文·H.奥罗克编:《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870年至今》,张敏、孔尚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16页。

和工业产品进行全面保护,从此之后,关税向上攀升最终于1910年达到顶峰。^①面对“新世界”廉价粮食的涌入,地少人多的德国遭遇了土地危机,同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本尚不充裕,德国社会联盟由此发生新的分化:曾支持自由贸易的容克地主在土地危机面前迅速转向保护主义,与重工业资本家结成联盟,劳工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总体依旧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俾斯麦趁势将支持保护主义的两股势力联合在一起,制定了1879年法案。该法案采取对工业品和农业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政策,既保护工业也保护了农业,“铁与麦”联盟诞生。1887年,意大利资本家和地主共同促成了统一提高关税的新税则,大幅度提高小麦、食糖的关税,加强了棉毛制品被保护的地位,实施了有利于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关税。^②历史学家艾德里安·利特尔顿(Adrian Lyttelton)认为:“1887年关税政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北方工业势力和南方地主因关税而结成了联盟,构成了民主发展的巨大障碍。”^③新税则启用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得到保护,而劳工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这样,法、德、意三国的地主、贵族、资本家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厂主通过对政权的把持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但是,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土地和资本要素所有者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因国际贸易扩张而受损的趋向。这些建制派力量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因这一轮世界贸易的扩张而被削弱。

在农业领域,“新世界”廉价的谷物借由愈发完善的运输系统和冷藏技术打开了欧洲市场,使欧洲国家的粮食价格降低。一方面,1875年后,由于北美大平原、阿根廷大草原和乌克兰黑土地的开发,北美、阿根廷和俄罗斯开辟出大量可供农产品生产的肥沃土地。1881年2月,美俄粮食的价格分别为119美分/蒲式耳,^④11.91卢布/蒲式耳,到1884年5月就已经下降到86美分/蒲式耳和6.85卢布/蒲式耳;^⑤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技术、工具的变革加之冷藏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使美洲、亚洲到欧洲的成本大幅降低,比如通

① Sanford Elwitt, *The Marking of the Third Republic: Clas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68—1884*,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70-272.

②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4—95页。

③ Adrian Lyttel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019—1929*, New York: Scribner's, 1973, pp. 11-12.

④ 1蒲式耳=36.368735升,常用谷物品种国际单位换算标准。

⑤ [德]厄斯纳:《经济危机(第一卷):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危机》,麦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过轮船将小麦从纽约运到利物浦的成本占价格的比例从11.6%下降到4.7%。^①这样,欧洲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地主在收入和财富上损失惨重。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化势头的不断高涨,吸引了欧洲国家部分土地所有者向城市进发,土地要素所有者的规模呈现出下降态势。

作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法、德、意三国的土地所有者都面临上述挑战。19世纪中期至90年代,法国粮食进口运费下降了近三倍,小麦价格下降了近两倍。^②土地所有者们渐渐发现城市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开始更多地向城市移民,农业人口缓慢下降。1841—1851年,法国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数字为84.9万,1851—1861年达126.5万,直到20世纪初,农村向城市移民的规模再没少于80万。^③德国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同样不乐观。19世纪40、50年代,德国容克地主的经济竞争力放眼欧洲都算非常高的,他们在有限的自然环境条件下通过改革和创新手段增强农场活力,德国农场的总面积得到扩大,从1851年的62.5万公顷扩大到1861年的71.5万。^④但是,随着“新世界”农产品的大量涌入,德国农业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小麦、黑麦等谷物进口量成倍增加,农业投资由1860—1864年间的5.76亿马克,下降至1877—1881年的2.82亿马克。^⑤19世纪70年代后,许多土地所有者不堪国际竞争压力和日益下降的农业收益,纷纷濒临破产。^⑥19世纪60年代,统一的意大利也避免不了这场农产品竞争导致的后果,1884—1887年间,意大利谷物进口从每年35.5万吨上升至101.6万吨,^⑦南方地区的土地贵族经济实力逐步减退。雪上加霜的是,统一初期快速发展工业的政策进一步瓦解了土地贵族集团,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被工业吸纳,农民涌入城市加入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大地主贵族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一去不复返。

在农业面临竞争压力的同时,英国、美国等更为发达的国家加快了对欧洲

① [英]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凯文·H.奥罗克编:《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870年至今》,第6页。

② Michael Tracy,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1880—1988*,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18.

③ 许平:《19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59页。

④ Nick Koning, *Failur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Agrarian Politics in the UK,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USA 1846—1919*.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46.

⑤ B.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y Statistics 175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01.

⑥ [英]W.费希尔:《德国的政府活动与工业化》,载W. W.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⑦ [意]保罗·贝洛赫:《欧洲贸易政策:1815—1914》,载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王宏伟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大陆国家商品的倾销和资本的输出,冲击了当时大工业发展尚不领先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市场对欧洲大陆的制造品贸易出口额在1854—1857年为20.3百万英镑,1871—1879年上升到41.2百万英镑,到1909—1913年间达到65.8百万英镑。^①此外,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欧洲大陆国家的重创给其他国家资本流入的机会,来自英国、美国等更发达国家的金融集团、银行家及先进工业企业得以更大幅度地向欧洲大陆国家输出资本。随着各国资本价格均等化趋势的发展,法、德、意三国的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高高在上的经济地位开始滑落,在意大利,古老的金融贵族甚至因为这场危机地位一落千丈,逐渐退出政治权力的中心。虽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这些国家与英国之间关税的不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受损程度不及农业领域严重,但这并不妨碍贸易扩张为欧洲大陆国家资本要素所有者带去旷日持久的危机。

(二) 国际贸易对反建制派的影响

作为反建制派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工是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对他们来说,自由贸易意味着更加廉价的食物、生活日用品和工艺制造品。在理论上,劳工在偏爱自由贸易带来便宜谷物的同时,也有可能担心自由贸易带来失业,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用现实说明,劳工是自由贸易的拥簇者,他们更渴望自由贸易带来生活成本的降低。^②更重要是,国际贸易将会提高欧洲大陆国家劳工的工资水平。在理论上,国际贸易导致工资租金比在国家间内趋于一致。欧洲大陆劳动力充裕,土地资源匮乏,工资租金比较低。由于大量廉价农产品的进口,土地租金价格相对降低,这样工资租金比相对上升。比如,1870年后的40年,法国的工资租金比增长了2倍,而德国的工资租金比增长了1.4倍。^③工资租金比的变化反映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劳工相对于土地所有者的境遇变得更好了。因此,劳工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

如前所述,法、德、意三国的地主、贵族和大资本家基于对政权的把持制定了贸易保护政策。三国劳工的收益由于贸易保护政策有所削弱,但这一时期

① [意]保罗·贝洛赫:《欧洲贸易政策:1815—1914》,第48页。

② K. O'Rourke and J.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MA: MIT Press, 1999, p. 107.

③ [英]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凯文·H. 奥罗克编:《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870年至今》,第16页。

世界贸易的空前扩张仍旧带给劳工阶级发展壮大的契机。正如罗戈夫斯基所指出的：“不可否认，保护的成本几乎都落在城市工人身上并且有意地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但是关税并不能夺取劳工因贸易获取的全部所得。”^①随着19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的急剧扩张，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的法、德、意三国劳工群体在规模、收入、工作技能和组织能力上都有迅速提高，从而积聚起更广泛的政治资源。他们逐步感知到自身正在增长的力量和抵抗束缚与压迫的能力，运用日益增长的经济收入和政治资源来更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首先，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企业吸收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工人队伍迅速壮大。法国小农经济发达，农村本来是人口的密集聚集地，随着铁路的开通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规模和速度大大发展，城市工业人口开始激增。^②19世纪60年代，法国仅巴黎就有45万名工人。就全国范围而言，法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850年的14.4%上升到1900年的37.4%。^③在德国，农奴可以通过交纳高额“赎金”给地主赎身的方式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1870年前后，德国全部就业者中约50%从事农业和林业，1873年从事大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力为543.9万人，大约占30%左右，到1913年，工业人口达到1137.7万人，连同商业和交通业人员一起超过了50%。^④德国拥有工人在50人以上的大企业数目，在1882年就达到全部企业数的0.3%，而在1895年达到0.6%。这两个年份这类企业中的工人数占到工人总数的比例则从23%上升到30%。^⑤因此，法德两国原本扎根土地的劳动力扩散到城市中，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意大利在1870年实现了政治统一，国内形成统一完整的市场，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意大利工人阶级人数1903年达到127万人，1911年增加到230多万人。^⑥中下层民众开始有机会依靠个人努力白手起家找到新的理想位置，在庞大的劳工队伍中找到组织的归宿。

①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 40.

② 沈坚：《关于法国近代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第49页。

③ 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④ 沈汉：《资本主义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页。

⑤ 〔苏〕伊·姆·范茵盖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⑥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其次,劳动力价格上升,工人的工资待遇有所提高。法国是三个国家中工资水平最高、增长最快的国家,劳动工资在经历了19世纪上半叶相对平稳发展后,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大幅度上扬。这种趋势在外省始于1847—1849年,在巴黎出现于1853—1855年,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工人工资上扬了70%—80%,随即有将近12年的停顿,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多年里又增加了25%—30%。^①德国工人的工资待遇在1820—1850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增长了近25%,1850—1870年间又继续增长50%,到1870—1914年间年度与周度货币收入都增长为原来的3倍。^②意大利的产业格局还正在经历农业为主到工业为主的变化,总体工资水平还不及法德。伴随着80年代意大利国内技术的进步和煤炭,蒸汽,铁路和电力等方面经济的持续增长,工人工资才出现稳定的上涨态势。如果以1860—1870这十年间意大利的平均劳动力价格为基数1计算,1870—1880年间的劳动力价格为1.222,城市劳动力工资率为1860—1870年期间平均水平的1.27倍,1890—1900年间城市劳动力工资率再度攀升,为1860—1870年期间平均水平的1.34倍。^③工资的增加导致工人寻求获得更高物质积累的可能性,进而期望通过影响政策的制定来追求更高的工资水平。

再次,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培训体制建立起来,工人的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实现长足提高。工业化带来的新机遇也给工人们提出新的要求,他们不仅仅需要学习新的技能和技术,还需适应工业化时代与机器相配合的工作环境与节奏。技术的改良和独立是劳工群体在这一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谁掌握了核心技能就意味着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占领先机。为此,教育培训体制在欧洲大陆兴起,某些大型工厂里学徒制从车间分离出来转由企业自身的某个学校来统一组织。如施奈德家族在1838年组织起提供初等教育和适应工厂不同业务所需的职业训练,到1873年相关的企业也建立起免费的教育场所,在这种方式的支持下施耐德家族为自己的企业培养了大批形形色色的

^① Maurice Lévy-Leboyer, and Francois Bourguignon, *The French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6.

^② [德]J. J. 李:《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载彼得·马赛厄斯、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册,第590页。

^③ Paolo Malanima, "Labour, Productivity, Wages in Italy 1270—1913,"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 Utrecht 19-21, Aug. 2004, p. 42, <http://www.iisg.nl/hpw/conference.htm>, 2017-04-06.

不同职业的专业人员。^① 法国和德国还特别创办了等级制的教育培训体制：最高一级是技术学校、柏林市民职业研究所；中间层次的技工培训学校，在法国是技艺与职业学校，在普鲁士是省属职业技校；最低一级的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在工艺、设计以及初级计算方面提供不同类型的地方课程。^② 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储备为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工人们从中也得以提升工作能力为其更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打下基础。随着与工业化所要求的专业技能的提高，工人们具有越来越强的能力来展开集体行动。

最后，日渐强大的劳工力量利用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相互联合，集体行动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在法国，工人的组织一开始为避免官方的镇压，只能披上“互助协会”的外衣，提供救济金、失业补助，帮助就业与社交，同时暗地里加入一些反对雇主的行动。里尔一个在当时拥有六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王室官员计算的拥有公共知名度的互助协会不少于106个。^③ 1840年，法国工人创办了第一份工人报纸《工厂报》。^④ 1868年，帝国政策转变后，工会开始公开出现，到1886年，工会成员可能超过了10万人。^⑤ 同时，地方性的行业工会不断形成，1892年，全国性的工会联合总部诞生。1848年，成立的全德工人兄弟会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全体性组织。此后，随着禁止工人结社法的废除，各行各业出现行业内部的工会组织。1863年，德国工人总联合会（全德意志工人协会）在莱比锡成立，其中包括11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和数千名会员，烟草业、印刷业、裁缝和木工等技术行业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组织。^⑥ 德国国家级工会组织在《工业法典》解决了合法性之后扩张更为迅速，1914年工会人数达到了300万人之多，占全部非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5%。^⑦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也出现了带有互助性质的工人组织——合作社。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权力的自我防御机制，合作社的主要诉求是改善低工资的现状、提高工

① [法]伊夫·勒坎：《大革命以来法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状况》，载彼得·马赛厄斯、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册，第395页。

② [美]戴维·兰迪斯：《1750—1914年间西欧的技术变迁与工业发展》，载哈巴库克、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第379页。

③ [美]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等译，第131页。

④ [法]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册，康新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页。

⑤ [美]里姆林格：《劳工与欧洲大陆国家》，载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王宏伟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页。

⑥ 同上书，第510页。

⑦ [德]J. J. 李：《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载彼得·马赛厄斯、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册，第593页。

人的购买力。到 19 世纪末期,手工业者和独立的农场主也开始在当地建立起小规模的生产 and 信用合作社。随着互助组织在法律上得到承认,意大利合作社第一次会议于 1886 年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国家性的联盟,这一联盟不久后被命名为全国合作互助同盟。到了 1910 年,合作社的成员超过了一万名。^①

四、法、德、意劳工的反建制主义政治动员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欧洲大陆国家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组织化的工人明确地将自身融入了公共政治生活中,从一次次经验中学会使用政治力量作为获得有利政策的武器。在法、德、意三国,劳工为争取自身利益联合起来,在常规政治和抗争政治层面均展开反建制主义的政治动员。日益壮大起来的劳工阶层由此开始了反建制主义的征途。

(一) 抗争政治层面的动员

因贸易扩张受益的工人阶级直接以罢工、游行示威、起义暴动等形式主动介入建制派把控的政治生活之中,动员民众反对建制派的剥削压迫。法国所有禁止社会组织法律条文和惩罚措施都抵挡不住工人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罢工运动依旧如火如荼开展。有研究显示,在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罢工运动为 68 次,50 年代是 77 次。^②“七月革命”后,以路易·菲利普为代表的金融贵族统治法国,建制派人士把获利的目光投向银行和贸易相关的资本运作,在金融政策上鼓吹着自由竞争在贸易政策上却几度提高关税。新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无法忍受建制派统治下不利的经济生活状况,更无法满足自己在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基于对保守的贸易政策、建制派双重标准的剥削和封建王朝的现存统治的共同憎恶,广大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共和派和王朝反对派达成反政府暂时联盟,在建制派的打压下从和平示威走向暴力起义,于 1848 年发动二月革命。1852 年进入路易·波拿巴统治时代后,法国工人运

^① Devi Sacchetto, Marco Semenzin, *Workers' Cooperatives in Italy : between Solidarity and Autocratic Centralism*, unpublished. <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2073>, 2017-04-08.

^② Charles Tilly and Edward Shorter, *The Shape of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60.

动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工人的经济状况未曾好转,1867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恶化了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因此,19世纪60年代末工人罢工运动又频繁起来。另外,本来最支持波拿巴恢复帝制的农民因为更加高额的赋税面临破产的处境,也加入反建制的活动之中。1870年9月4日,巴黎公社运动爆发。在这波反建制主义中,工人阶级反对的主要是帝制和波拿巴王朝的统治,尚未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此时的工人阶级可以接受同样是革命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当政。尽管如此,巴黎公社运动也可被看作是反建制派尝试打破国家机器重建新体制的一次伟大尝试。

到19世纪40年代,德国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企业主的工人武装起义。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们在建制派收紧的贸易政策和企业主贪得无厌的剥削下苦不堪言,他们烧毁机器和账簿,袭击企业主的住宅、工厂和仓库。随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带给德国工人阶级巨大的信心,随即柏林爆发3月18日起义。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工人运动也沉寂了一段时间。到19世纪60年代,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活动家拉萨尔又开始宣传鼓动,工人运动再次被发动起来。1872年,德国几大城市都发生了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斗争。但拉萨尔并不主张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争取普选权促使国家成为“自由的国家”,更直白的说,也就是与俾斯麦政府合作,这反而使得德国工人运动无法充分发展。19世纪末期,社会民主党统一之后工人运动愈演愈烈,已经无法被俾斯麦控制。1889年,鲁尔区九万工人参加罢工,直到1890年一年半不到德国就发生罢工1100多起,参加人数近40万人。^①

1891年,意大利的关税水平再次提高,劳工阶层出现严重的反抗情绪,动荡的叛乱相继在南部乡村爆发但被当局镇压了下来。被压制的工人运动愈发激烈,从局部地区的失业工人群众扩展到全国范围内的全民罢工运动。1898年,米兰爆发工人骚乱,1904年又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运动。统计显示,意大利在1896—1900年间共发生大大小小罢工1525次,1901—1903年罢工总次数又增加了一倍多。^②随着罢工运动的开展,意大利工人阶级开始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独立地进行反建制主义运动。

激烈的社会运动是反建制主义最为直接的体现,是有组织的政治结社无法在既有体制内争取权益,进而寻求在现行体制之外通过暴力手段争取经济

^①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工人运动史教研室编:《国际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②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权益和政治权力的动员形式。在一次次兴起和被镇压之中，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人阶级积累了丰富的抗争经验，进一步对反建制力量和建制派力量的对比有了更加清醒的定位。欧洲大陆各国反建制派劳工力量在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进程中互相支援和帮助，将反建制主义运动从国内层面推向国际层面，国际工人运动渐成气候。

（二）常规政治层面的动员

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劳工群体在法、德、意分别逐渐形成了有明确纲领的政党组织，反对建制派的政权，参与政治选举。虽然巴黎公社最终失败了，法国的劳工运动已经积蓄起充足的力量，不仅满足于行会与工厂这样的活动组织，而且孕育出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1879年法国工人马赛代表大会上，法国工人党成立。其后，盖得和拉法格起草了工人党的纲领，确认其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强调争取工人立法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是党的最迫切的要求，但是，改良派对此纲领提出反对意见。在改良派看来，工人积极的活动一开始的目标不应太过激烈，应局限在“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内，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多数在1882年的代表大会上抛弃了盖得提案，这导致了法国工人党的分裂。改良派组织后来确定其正式名称为“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

德国兄弟会在1848年第一次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一举动表明了德国工人的政治独立意识和阶级意识开始生长。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拉萨尔与俾斯麦合作的思想影响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的学生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到柏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被驱逐出柏林来到莱比锡遇到了倍倍尔，两人一同努力促进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化，一个摆脱拉萨尔主义的新的工人政党正在酝酿成熟。1869年8月7日至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大会在爱森纳赫召开，成立之初就吸纳了反拉萨尔的几千人联合会成员，70年代初发展到一万多人。70年代开始，德国工人阶级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俾斯麦政府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逮捕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监视党的活动、禁止印发党的报纸。这一发展要求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尽快联合以便团结成更大的反建制力量。1875年5月，两派终于完成合并，建立了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定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反建制主义极具代表性的成果。列宁在1910年对此评价道：“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法

制,建立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组织,创办了卓越的刊物,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精神提到了最高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①

在意大利,工人政党在与建制派的斗争中也有新发展,新生政党成为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力量。1881年,罗马尼阿革命社会党在里米尼社会主义秘密代表大会上建立。1882年8月,意大利工党在米兰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上成立,三年后成员就已超过三万人。这一政党是只代表工人利益的政治组织,拒绝接纳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农民,其纲领在于保卫工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②1892年,324个工人组织在热那亚召开第二次联合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了全国性统一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党(1895年改名为意大利社会党)成立。党的纲领中指出,工人阶级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而且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剥夺统治阶级”。^③社会党在壮大的工人阶级中逐渐赢得了威信,1902年已纳成员六万人,^④在随后轰轰烈烈的反建制主义运动中,社会党代表工人阶级同建制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1870年以后,欧洲大陆国家陆续实行建立在广大投票权(有时甚至在理论上是男性普选权)基础上的投票制度。^⑤反建制派力量积极地利用选举制度改革契机,参与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斗争并切实达成了建制派的一些让步。1875年,法国宪法规定了男子享有普选权,让普通大众开始意识到了“一人一票”制度下自己的权利。1893年,88%的议员是大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出身,1902年一些中低级社会阶层人士得以进入议会,当年有30名议员出身工人或农民。^⑥这一数据说明了国际贸易扩张期法国充裕的劳动力要素和愈发充裕的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在政治地位上不断上升,开始有能力替代保守的土地贵族势力和旧阶级交融的显贵阶层。在德国,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之后,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推动了党的发展。在帝国议会选举中,1876年,社会民主党得到了35.1万张选票,1877年增至49.3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9%以上,成为德国第四大党。1885年,经历过被迫害、驱逐、关押的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上依旧获得了55万多张选票,24人被选为国会议员。1890年,帝国

①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16页。

②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第5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⑤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1875—1914》,第105页。

⑥ 许平:《19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56页。

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之一,获得选票 142.7 万张,在议会中拥有议员 35 名。^① 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威望大大提高。1895 年的选举中,社会党共获得了 7.6 万张选票,是上次得票总数的将近四倍,争得了 11 个议会席位,是以前席位的两倍。社会党在议会中拥有人数众多的党团,在一些地区的市政机关中甚至赢得了大多数代表席位。在欧洲大陆,“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 35—40% 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②法、德、意三国工人阶级政党所获选票和议席的增长充分表明了三国劳工在反建制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结 论

19 世纪中叶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启动为欧洲大陆国家国内政治的发展引入新的因素,打破了地主、封建贵族和官僚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局面。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在要素禀赋上属于劳动力充裕而土地、资本稀缺的法、德、意三国发生了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作为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土地和资本所有者在贸易开放中利益受损,虽然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减少自身的损失,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因世界贸易扩张而受损的趋向。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三国劳工从贸易开放中获益,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进而积累了更多的政治资源。由于土地和资本要素所有者把持了国家政权,劳工必须通过反建制的政治动员先靠近政策制定权来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诉求。通过常规政治手段和非常规政治手段,三国劳工向建制派发起全面挑战。反建制主义兴起后,欧洲大陆国家的建制派更难将劳工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工人阶级成为塑造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力量。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接踵而至的大萧条,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嘎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的重现和经济的复苏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机会和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前行。对当今的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资本毋庸置疑成为充裕要

①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工人运动史教研室编:《国际工人运动史》,第 113、119、121 页。

②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1875—1914》,第 142 页。

素,人口增长的放缓、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劳动力从充裕变得稀缺。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富人、资本家、高技能人士想继续维持现有政治经济体制来推进全球化,以便利用巨大的国际市场扩大财富,或在全球便利地转移资本和产能,寻找廉价劳动力产地。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劳工等中下层人民在这场全球化中丢失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生活条件恶化,政策制定权离自己越来越远,新一轮反建制斗争由此爆发。只不过由于这些国家要素禀赋的变化,这一轮劳工反建制主义在贸易领域的诉求由支持开放、推进自由贸易转变为反对开放、实施贸易保护。

环顾欧洲,中下层民众新一轮反建制主义似乎已靡然成风。在英国下议院全体工党议员、多数保守党议员都支持留欧,各金融机构都预测留欧的情况下,2016年6月的全民公投却选择了脱欧;2016年12月,意大利总理伦齐以政治前途为赌注的修宪公投在反建制派的阻击下没有过关,不得不黯然辞职;2017年5月,法国大选50年来首次出现了左右两大主流政党候选人均遭淘汰、两个建制外的候选人争夺总统职位的局面。由于传统政党和机构无法灵活应对大量民众提出的新诉求,各国反建制的政党组织或者社会运动纷纷抬头,譬如德国选择党、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可以”党、荷兰自由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2016年6月,反建制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候选人拉吉当选首都罗马市长;2017年9月,德国选择党以12.6%的得票率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2017年10月,极右的奥地利自由党以26%的数字创造了该党在近几届议会选举的最高得票率;同月反对过早加入欧元区、支持关闭欧洲边界、主张不接受难民的捷克新政党 ANO2011 运动党赢得了议会选举。这些事态都是典型的享受全球化收益的精英阶层和倍受全球化冲击的底层人民相撕裂的案例,国际政治的新面貌开始表现为民众所支持的反全球化与精英所支持的全球化之间的对抗,在国内政治中则集中表现为反建制派与建制派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战。作为中下层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工在反建制主义中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对抗和争夺的结果。